遥望北方

——我与《语文报》的故事

□冯尧

题记：去年，山西语文报社开展了一个“金色邀约”活动，邀请当年的小作者讲述自己与《语文报》之间的故事，勾起了我诸多回忆，信笔记之——

岁月匆匆，白驹过隙。

人的一生中，总有些人让你魂牵梦绕，总有些地方让你久久遥望。

山西，便是我的遥望之地。因为那里有我太多难忘之人，有我太多热爱之人，有我太多感谢之人。

一言难尽。

与山西结缘，自然是《语文报》。

1989年，我从乡下考进县城读高中，第一次在报摊上看到《语文报》，对于一个从小喜欢读书热爱文学的青年学生而言，无疑是久渴之人逢甘露，自然是一见倾心。先是读，再是写，然后偷偷摸摸试着投稿。

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和往常一样，计算着新的一期《语文报》该出版了，便又一次来到报摊前，从众多报刊中拿起《语文报》，翻开“发表园地”栏目，居然看到自己写的一则散文诗《生存的含义》刊登在了上面。那一瞬，只感觉手在颤抖，心悬在了嗓子眼，真想大声喊叫几声，向世界呈现自己的激动和喜悦。

文学带给一个少年的快乐，无与伦比。

直到今日，我也不知那篇文章是哪个编辑选中的。当时《语文报》在全国期发行量上百万份，投稿的人不计其数，作为一个小地方的穷学生，文章能在《语文报》发表，该是多么幸运和幸福。

此后，《语文报》先后发表了我多篇文章，有诗歌有散文，都是自然投稿，也不认识报社什么人。从此我的心里，对这份报纸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对这份报纸的编辑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后来走上报纸编辑之路后，也坚持以质论稿、公正选稿，很少受私情影响，也因此发现和培养了不少作者，甚至引他们走上文学和新闻之路。

每次文章在《语文报》刊发后，都会收到天南地北无数来信，也因此结交了很多笔友。

山西太原的张建新便是其中一位。彼时，我们都在上学，鸿雁传书之间，交往渐渐密切，感情日益深厚，还共同出版过几本文学小册子，并相约找机会见面。

那时，天是蓝的，风是甜的，世界美得不可方物。

然而人生总有意外，生活亦会戛然而止。

1992年上半年，我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高三学生、文学少年，对未来有着太多期许和厚望。当年四月，《语文报》用两个整版重磅刊发了我和桂爽联袂署名的小说《无法命题》，这篇被专家喻为“中学生小说的里程碑”的文章，却在我就读的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原因在于，有一位老师在阅读这篇小说时对号入座，说里面有讥讽他的情节，并发动全校师生，专门挤出时间，对这篇小说进行公开批评。

众口难辩。

几十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那篇小说虽说发表于高三时期，其实是高一下学期开学时写的。或许是年少轻狂，虽然是小说，但其中可能有意无意写进了一些现实中真实的例子，误伤了那位老师，才引起了他那么大的反应。

总之，1992年下半年，我的人生一下子遭遇断崖式打击，跌落谷底。

不得已，如同一只丧家之犬，我带着一大堆发表的诗文，回到偏远贫瘠的乡下，和父母一起躬耕田园，惨淡度日。

穷途末路之际，张建新邀约我到山西，筹办晋祠笔会，创办诗歌刊物。当时，我还从未离开过故乡，从未出过四川。于是，从父亲那里要了40元钱做路费，一路北上，闯天下。

关于这段北上的经历，多年之后的2014年，我曾写过一首新闻体诗歌《山西行》断断续续地叙述：“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山/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我觉得自己长出了翅膀/在大地上飞//我只是一个流浪少年/眼里有梦/兜里没有一分钱//我们没日没夜谈论写作/四处拉赞助/筹办笔会/充满理想的年华/梦里也会笑出声来”。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山西太原待了一个月，也想找点事做，但终是无果，每日只得靠建新、国伟、水文等接济度日，终不是办法。无奈之下，唯有打道回川，另谋他途。

回川需途经临汾，那里当时是《语文报》编辑部所在地，我自然是要去拜访一下的。还有一个目的，是想找到编辑老师，先写点文章预支点稿费做路费。可惜我去的时候恰逢周末，在山西师范大学一栋只有三四层高的木楼里，我找到了《语文报》编辑部，朴素，简陋，却自带光芒。等了很久也没有遇到谁，后来到资料室花两元钱买了几大本刊有自己文章的合订本，怀着几丝遗憾，继续回川之路。

从临汾到四川，我躲在火车的厕所里逃票到绵阳去找一个女笔友借钱；在成都火车北站，睡在屋檐下，垫着当枕头写了多年的诗也被偷了，最后厚着脸皮去金堂找笔友吴世松借路费……这么多年过去，我欠下了很多人的债，一直没还。

回川之后，毛遂自荐到达州日报社，蒙李贵老师收留，从此进入媒体行业工作。我深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加之疾病缠身，几十年里，断绝了同外界的联系，甚至渐渐疏远了文学。

大约是1993年吧，《语文报》新开辟了一个“拓荒者”栏目，推出了一些文学少年的作品，其中第二期是我。发的什么作品记不得了，只依稀记得那期编者按表达了对我命运的关切，其中最后一句“冯尧啊，你青春的驿站坐落在哪里？”记得当时读到此处，潸然泪下。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依然能感受到一个编辑对作者的那份关心、温暖和鼓励。

人生总有故事，生活诸多折磨。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何之前那个激进勇敢九死不悔如堂吉诃德般的文学少年，在某个阶段会戛然而止隐姓埋名，从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和自我否认阶段，并且远离文学放弃文学得如此决绝，一下子就是二十年。这期间，当然与我对文学的认知发生转变有关，因为我不想借文学之名沽名钓誉，也不想借文学之势而自我拔高。更因为，文学在带给我快乐的同时，也一次次带给我惨痛遭遇，甚至对我的现实带来毁灭性打击。从此，我放弃崇高选择平庸，放弃荣誉选择沉默，放弃坚守选择世俗，一步一步远离了最初的那个自己，而活成了当初最讨厌的那个自己。我猜测，《语文报》编发我文章最多的人可能叫任彦钧，后来从《星星》诗刊等报刊读到他的诗，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笔名叫任悟。

几十年之后，当物是人非，才发觉离开文学之后的那个自己无非是一具行尸走肉，活得那么虚假和伪善，其实从未感受到一点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于是乎，2013年左右吧，又重新提笔，于工作之余练习些长短句，聊以安抚日渐荒芜的人生。

多年以来，虽然远离文坛，也疏于同当年的文友联系，但对《语文报》的培育之情，对《语文报》编辑老师的敬仰之情，对山西朋友的相助之情，从来没有忘却过。相反，随着岁月流逝，这些情谊愈发浓烈，历久弥香。

遥望北方。

那里有我的青春、足迹和梦想，那里有我可亲可敬的人。

祝福北方。

最大的愿望，是今生有机会再去一次山西，再去一次《语文报》编辑部，向那些在我成长之路上给予过帮助和温暖的人，说一声谢谢。

阅读的“时间段”与“年龄段”

□赵柒斤

网上翻报纸，读到诸如《春天正是读书时》之类的“应景随笔”，我就纳闷，难道其他季节就不能读书？难道立秋后评出的鲁奖及各地举办的书展就不是为推动阅读更上一层楼？由此，我觉得阅读不仅不能分季分时段，而且智能阅读时代，一屏在手随时随地皆可“读”。

如果真想分，不妨参照古人的“四季阅读法”。明代学者陈继儒《小窗幽记》谓：“夜者日之余，雨者月之余，冬者岁之余。当此三余，人事稍疏，正可一意学问。”夜晚是一天所剩的时间，下雨是一月所剩的时间，冬天则是一年所剩的时间，在此三种剩余的时间，人事纷扰较少，正好可用来专心读书。时至今日，这“三余”之说虽不靠谱，但“夜者日之余”并非妄言。也就是说，只要想阅读，天天有时间。

诚然，当阅读成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就跟穿衣、吃饭似的成了每天必选动作。清代文人涨潮《幽梦影》则畅谈了读书与季节的关系：“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由此可见，跟陈继儒一样，涨潮也主张四季皆可读。

现代人很难按涨潮指引的四季书单阅读。可我觉得，任何一本好书，大体分三部分，即时代背景、文本和精神或意义，时代是书的土壤、文本颇似书的枝干，精神或意义则是这株树所开之花、所结之果。一代代人打从此树下经过，所见之花、所尝之果，味道都不一样。树一动未动，每代人乃至每个人不同年龄段“赏花品果”，都能品出不同滋味、解读不同的意义，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正是书的魅力及书与人的特殊缘分。

从小到今，我都凭兴致而读。记事和读小学时，仅有课本和连环画，父亲有时间便带读《诗经》《弟子规》《百家姓》及一些古诗词。当时摇头晃脑地背诵“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等并强记下来，主要应付父亲临时“抽查”；读高中时，业余时间读《礼记》等历史经典，主要应付考试，其时段阅读的功利性非常强；上学期间，闲杂书均是避开父母和老师监管“偷读”的，印象却深刻。

高考结束那一段时间，受《上海滩》《射雕英雄传》等武打剧蛊惑，一度“废寝忘食”地偷读《三侠五义》《水浒传》传统武侠小说及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新派武侠小说，常常一周翻一套、一个通宵读一本，“速读”由头就是热切希望先人一步地掌握故事主人公的结局，积蓄“吹牛”本领……走上社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喜欢跟风，热衷翻畅销书，往往“别人一说就去抢读”“电视刚播就找原著”，结果读得多，记住的少，甚至作者的名字转眼便忘。

倒是上学期间偷读的经典名著和现在经常翻的古人诗词、笔记小说等，却无法从脑海清零，且每翻一次都能翻出新意。如今翻阅《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历史名著，印象最深的都是中间部分，结尾反而很无聊。非常认同金圣叹先生直接把《水浒传》“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的50回拿掉的建议；也觉得《三国演义》写到“夷陵之战”就结束，不仅不影响阅读兴趣，反而会激发读者“头脑风暴”；曹雪芹的《红楼梦》即使没写完，并不影响它成为小说之王。

这大概就是阅读“年龄段”的区别吧。如今的作者、读者或许中电影电视剧“毒”太深，写书的、看书的都希望有明确的结尾。若一本书重过程轻结尾，会令读者错愕：“这就结束了？”比较后就轻而易举地发现，曹雪芹等文学大咖的“匠心独运”。因为古往今来，生活往往就充满有头无尾的故事……

看到跟疫情对峙3年来，身边人都自觉戴口罩、不扎堆、少出门，人人都管住自己。突然觉得，这与中国人守礼有关。重温《周礼》《礼记》等发现，跟西方“法无禁止皆可为”不同，中国在法之上，还有“礼”。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礼”，其根源不是宗教，也非上帝，而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起源于吃食的文明化，后来发展为吃饭的仪式和规矩，再往后就把所有各种尊敬神和人的仪式，一概称“礼”。使“礼”的内容无所不包，甚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等都有老百姓日常行为的规范。现在想来，那时的“礼”真没白读。

真切感受，阅读虽与“时间段”产生不了多少化学反应，却跟“年龄段”有很大关系，这不仅包含阅读速度、阅读内容等区别，更重要的是品咂的滋味大相径庭。小时候不分时间段“囫囵吞枣”地翻书；而如今每天看书，总喜欢“磨蹭”，一段文字甚至一句话不弄明白，绝不一眼带过，蒙混过关。这就是阅读“时间段”“年龄段”的本质区别。

全民阅读 书香达州

第一次吃北京烤鸭

□刘秀品

最近与老战友马镇相聚，回忆起我们第一次吃北京烤鸭的事，十分有趣。

1971年，我在原190师政治部宣传科任新闻干事，和师直政科的左干事、炮兵团报道组的马镇，将一篇重要稿件送到解放军报。

1971年6月初，我们三人来到解放军报，先将稿件交给了编辑部，随后住在北京等候消息。

那时候军人到北京出差住宿很方便，只要把部队团以上的介绍信往位于东单东四胡同的总参第四招待所吧台一递，营以下干部战士两个人一间房，免费入住。

“刘干事，今天中午我们去吃北京烤鸭吧。”第二天上午，马镇向我和左干事提出邀请。

“北京烤鸭？稀罕东西，肯定很贵哟。”马镇的邀请一提出，我马上想到“银子”的问题。

“我昨天晚饭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去侦察了一下，整只烤鸭是5.8元。”马镇说。

“天王爷，5.8元，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我那时行政23级，每月工资52元，部队除了发放军装和黑色三接头皮鞋外，吃饭要交钱，被褥和内衣要自己买，我还得节约钱支持在农村的穷家，经济上经常捉襟见肘，自嘲属于“2352部队、月月光中队、欠债小分队”，听说一只烤鸭要那么多“银子”，直咂舌。

“贵是贵点，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我请你们。”马镇慷慨地说。

马镇那时入伍三年，还没提干部，每月津贴费8元。可他父亲是老红军，时任长春某独立师副政委，他不但津贴费全部自己花，还时不时从家里要点“救济”，别看是穿“两个兜”的战士，可经济上比我穿“四个兜”的军官要牛得多。

全聚德就在东单王府井，离总参第四招待所的直线距离不到500米，既然马镇有心请客，我们当然恭敬不如从命。离午饭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提前来到位于东单的全聚德，选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

那是我第一次吃北京烤鸭。

全聚德不愧是享誉世界的餐饮名店，排场很大，服务很上档次。我们刚点了吃整只烤鸭，服务员先给每人送上一条冒着热气的白色方巾，净完手，立即摆上三个茶盅，倒上香茶。没过多久，服务员推着小车，车上放着一个尺把长的陶瓷方盘，一只刚出炉的烤鸭卧在盘子里，颜色金黄，请我们过目。那只鸭子有多重？恐怕有五六斤吧，肥滚滚的。后来我多次进各地的烤鸭店，说心里话，觉得那些也打着北京烤鸭旗号的鸭子，一个个瘦骨嶙峋，斤把来重，似乎给北京王府井烤鸭店的烤鸭当孙子都不够格。

主菜上桌前，先摆上的是小窝头、豌豆黄、芸豆卷、肉末烧饼、羊眼儿包子、五福寿桃等六碟北京小吃，当被拉成片冒着油的鸭肉上桌时，包饼、大葱、京酱、黄瓜丝等吃烤鸭的配菜跟着上桌，最后上的是鸭架汤，使一次很普通的午餐顿时生出一种庄严的仪式感。

几个人挽袖上阵，大快朵颐，吃得嘴角油水直流。我们当时都是嚼得碎钢钉、咬得断铁丝的年纪，食肠宽大，本以为可以将那一只烤鸭包括摆在桌上的所有食物一鼓劲风卷残云，殊不知我们是“眼睛大，肚子小，端上桌的食物消灭不了”。吃着吃着，觉得烤鸭油大腻人，吞咽困难起来，只好盛碗鸭架汤慢慢品尝，将至少还有四分之一只的鸭肉剩在了盘子里。

“几位同志，这些东西你们不要了吧？我还没有吃过烤鸭，能不能让我尝尝？”我们准备离席时，旁边桌子上的一位食客来到我们桌边，指着盘子里的烤鸭肉问。他一口的京腔，一身藏青色中山服，不寒酸，不窝囊，有修养，很干练，可他的桌子上只有两样家常菜，进烤鸭店却没点烤鸭。

“我们不要了，你端去吃吧。”马镇笑着对那个人说。那时还没有打包这一说，不吃也是浪费。

一听这话，那人立即将烤鸭肉和鸭架汤端到了他的桌子上，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住在北京的人不一定吃过北京烤鸭。”回来的路上，马镇说起那位向我们讨烤鸭肉吃的人，感慨万千。

解放军报很快发表了我们的稿件，我们怀着完成任务的喜悦回到部队。

时间一晃过了50多年，这次在三亚度冬，马镇来家看我，说起第一次吃北京烤鸭，还向我补充了这样一条幕后消息——当他那老红军父亲知道他花5.8元钱“嗨”北京烤鸭的事，还狠狠地说了他几句：“你一个战士竟敢花那么多钱吃北京烤鸭，我1957年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按规定我们这一级的干部一年可以接妻子到北京住20天，我都没舍得带你妈妈去东来顺、全聚德吃饭。”意思是批评马镇太铺张了。如今，马镇的父亲早已仙逝，可复述起父亲批评他时的情景，马镇仍满脸通红，眼渍渍的。

我觉得，马镇的父亲批评马镇，倒不是心痛马镇请我们吃烤鸭花的那点钱。马镇的父亲担心什么呢？担心马镇丢掉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记忆

巴人民俗图志(18)

□冉奎 谢兴双 宣汉县地方志编纂中心提供

2015年1月摄于毛坝镇

壁画

壁画属于墙壁上的艺术，是直接画在墙面上的画。作为建筑物的附属部分，装饰和美化功能使它成为环境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图为毛坝镇姚氏宗祠壁画。

木雕窗花

木雕窗花一般用在门窗、隔断、屏风、橱柜门等上面，形状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半圆形、方中套圆形、圆中套方形。用料大多选取名贵木材，窗花往往寄托主人的愿望。

2018年10月摄于马渡关镇

磉墩

磉墩又称柱石、柱础，居于立柱下方，起着隔绝地下水气对木柱的腐蚀作用。马渡关镇刘家大院有刻有“中、流、砥、柱”“於、斯、万、年”八个磉墩。

2018年9月摄于马渡关镇